

名家对话

依附于土地的生命，都会生机勃勃

尹学芸 胡晓舟

“我在她身上看到了很多属于女性的东西”

胡晓舟：尹老师的最新长篇小说《太和》在今年8月出版后引发读者和评论家的关注。这部小说描写一位即将年满百岁的农村老人潘美荣摔伤卧床，在现实与虚构交织的情境中，她人生各个时期的生活片段不断浮现、穿插、闪回。幻觉中，她觉得当年投水而死的丈夫变成绿毛怪，在不时地跟她对话。在记忆和幻想营造的亦真亦梦的叙述基调中，这个蓟州当地农村称为“囤子媳妇”的童养媳的故事呈现在读者面前，让我们看到一个女性走过的百年人生之路。您是怎么想到写这个题材，写这样一位女主人公的呢？

尹学芸：这本书写于2020年。如果没有那样一段大块的居家时间，可能到现在这本书仍然是一个框架，依然是活在我脑子里的一些元素。这样的元素其实有很多。就是因为那个时段突然有了创作的时间，激发了我写小说的欲望。

这个素材本身，在我的生命里已经活了很久。村里的一个童养媳，小小的个子，穿阔大的蓝襟大袄。我现在也能想起她的样貌。她是我视线之内的人，我看着她变老，她看着我长大。她大概也就一米四几的身高，让你疑心她从没见过吃饱过肚子。她一辈子也都没有穿过新衣服。据说她有新衣服，但是她穿出来永远是旧的。她把新衣服的膝盖跟屁股的地方都补上大红补丁才能穿出来。那是一种爱惜，仿佛穿件新衣服就是罪过。或者，是种自甘轻贱，觉得自己跟新衣服不匹配？没人问她原因。人们都忙自己的，没人关心她的小脑袋瓜里都想些什么。有一天我放学回家，她揣着袄袖在街边走，突然走过来问我，二孙女，你说我是不是日本人？记得我当时笑了，可后来我却哭了。她5岁时被家人送来做童养媳，从此再没见过家人的面。那一天她迷茫地看着我，我也迷茫地看着她。不知道她为什么突然操心我自己的国籍问题。她小小的、瘦瘦的身形站在那儿，灰白的头发在瑟瑟的秋风里爬满了心事。

在村里，这样那样的故事总是很多，但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这样一个童养媳。村庄是大村，童养媳肯定不止一个。但我跟她是最为熟悉的。后来我出去参加了工作，她还曾找到我。她家积攒了一些大铜子，大概50枚。她老伴已经瘫痪在床，还把这些东西绑在身上。她是趁老伴睡着从他身上解下来的，这些大铜子把他的皮肉都磨烂了。

我在她身上看到了很多属于女性的东西。母亲的，姑姑的，奶奶的，乡邻的，三婶子、二大娘的，一代一代的女性的命运，都在她的身上得以呈现。她们甚至没有属于自己的名字，都在烟火岁月里湮没了。我写到“潘美荣”这个名字时，就想到了很多往事。我读高中时填表，母亲一栏的名字还有填“李赵氏”“张王氏”之类的。她们在娘家是有名字的，可却在“出一家人一家”的迁徙中把名字弄丢了。她们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她们的付出能满足所有人的需求。

这差不多是所有女人的宿命。我在很多年前就想为这些群体写一本书。唯其微不足道，才觉得应该有人道来。无数的小人物，在隧道一样的人生旅程中诠释命运感，很高兴我能实现这个愿望。

胡晓舟：您在乡村和城市都生活、工作过，您的小说营造了一个您熟悉的文学世界，里面的人物大部分都是处于基层的小人物。这些身份普通的人物在您的笔下却都呈现出人性的复杂性和丰富性。您的选材、剪裁眼光老到，对人性的观察、体察精微，真正体现了温柔的文学之光，让人们能增加一份对他人的理解和宽容。《太和》中的潘美荣心中有爱有亲情，也有委屈、不甘和抗争。从8岁到刘家做童养媳，潘美荣受尽了表姨也就是婆婆的磋磨和苛待。到婆婆死后，我们看到一个老人同样令人感到心疼的地方，看到潘美荣对地的善意。潘美荣一辈子自尊、要强。比如，她厌恶被称为“囤子媳妇”，要做堂堂正正的潘美荣。而丈夫刘方和张二花通奸并被当众羞辱令潘美荣不仅颜面无存，还被人孤立。刘方也投水自尽，留下潘美荣一个人养育三个儿子，支撑贫困的家庭。潘美荣当然恨张二花，最终却选择和解，放下了恨意。您在《太和》中怎么看待这些女性的爱与恨、怨尤与宽恕？

尹学芸：我在乡村和城市的生活差不多各占三十年。这让我经常有一种跳进跳出之感。比如，站在坝城的角度去看窄村，或者站在窄村的角度去看坝城。过去故乡只是一个概念，只有当她真正进入文字，才会变得具象。这种感觉很特殊，因为只有在有的时候，你才真正了解她，会对所有的细枝末节感兴趣。当你感受到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都是乡亲，你才真正活成了他们中的一分子，为他们的幸福而高兴，为他们的不幸而哀伤。我真正感受到女人这样一个性别时，是在一大片谷地里，那种叫作“薅苗”的劳作需要长时间蹲在地上，一个妻子不时要托一下身体。原来她有子宫下垂的毛病。现在想，她既然有病，为啥还要从事不相宜



尹学芸，天津市作家协会主席。著有散文集《慢慢消失的乡村词语》《遍地都是野芹菜》，长篇小说《菜根谣》《岁月风尘》等，中篇小说集《我的叔叔李海》《士别十年》《青霉素》等。曾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、《小说月报》百花奖、《当代》文学奖、《北京文学》优秀作品奖、首届梁斌文学奖、林语堂文学奖、孙犁散文奖等。作品被翻译成英语、俄语、日语、韩语、阿拉伯语、土耳其语等多种文字

的劳动呢？但当时没人注意这样的事。她自己也不觉得这样的劳作不相宜。漫长的岁月中，女性不断接受来自社会和世俗的规训。很多时候，意识不到自己的权益。这样一种悲怆感，特别让人心疼。

乡村和城市有不一样的秩序和规则。我历经多个岗位，其实也是在工作中扮演各种不同的角色。这让我有机会洞察人的内心。爱恨情仇是人类永恒的主题。小说中的潘美荣与其说选择原谅别人，毋宁说选择原谅了自己。因为她知道，这可能是她最后的机会。这里有属于她的智慧，也有属于她的无奈。迈不过去这道坎，与其说无法面对他人，毋宁说无法对自己。她心底的结，不仅与丈夫有关，也与原生家庭有关。我刻画这样一个角色，也是受生活的启发。

我在生活和工作中的，都不是一个刻薄的人。对笔下的人物，更多的是怀有一种宽容和悲悯。我写中篇很多年，写过各种各样的人物，用敦厚的语言叙述，用慈悲的心面对，是我给自己定的基调。遵循生活的准则，写出人生的酸甜苦辣。在潘美荣身上，你可以读出女性悲伤的一面，也可以读出她不悲伤的一面，她甚至有一点傲娇的资本，哪怕是在一种虚空中。人生就是这样，大有大的不周，小有小的收成。就潘美荣的整体命运来说，悲伤肯定是底色。但人生是一个漫长的旅程，抵达终点的方式有很多种。其中和解很重要，和解意味着圆满，意味着从心理和生理都能够自恰。这其实才是大关键。

书中我写的其实是两座大洼，是蓟州的两个滞洪区。我的老家叫青甸洼，是窄村所属的地方。还有一个东洼，叫太和。我从小就对太和洼抱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，因为遥远而神秘，因为有不寻常的水土和风情。这样一种差异性也构成了文本中的故事框架。所以潘美荣所处的区域，所面临的情态，也因为差异性而生出变数。她的幸运和不幸都是时代的一部分，是很多女性不约而同的经历。

人生就是不断获取和放弃的过程

胡晓舟：小说中的潘美荣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文学形象，在她身上有很多矛盾之处。她自尊、倔强，具有反抗精神。比如，小说中有一个细节，婆婆分给家里每个人一个鸡蛋吃，但没有潘美荣的。那时候刘方对她比较好，就把自己的鸡蛋让给她吃，说你吃完不要让父母看出来。潘美荣却一定要把鸡蛋留在嘴角上，就是要让婆婆看出来，鸡蛋你儿子让给我吃了。还有过队伍的时候，红军女兵睡在地炕上，她和女兵说身世、说苦处，说心里话，把家里最好的白面拿出来烙饼给女兵们。红军女兵说我们这里也有童养媳当兵的，你跟我们一起去，咱们就去队伍上。可是潘美荣又犹豫了，最终选择留在家里。潘美荣所有的不平与抗争，到小说最后都归为放下和包容，成为一个具有宽广胸怀的女性形象，可以说进入大和、太和的和谐之境。您能谈谈您为什么采取这种艺术处理方式吗？

尹学芸：人生就是不断获取和放弃的过程。我经常在想这样一个问题，生命进程中的不确定，都是选择带来的。命运不能假设，生活也可以。很多细小的分子构成了生活，而生



胡晓舟，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，编审。从事出版工作20余年，策划和编辑的作品《中国京剧图史》《乔伊斯传》《梦断关河》《北方佳人》《纳兰词新解》《心居》等获得中华优秀出版物奖、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提名奖、北京市文学艺术奖，入选向全国推荐百种优秀民族图书、年度“中国好书”等

活本身又构成了命运。这样一本书，也是想阐释命运为何物。

我心里，我觉得这是写给天下母亲的一本书。中国母亲是一个独特的存在，她们比世界上任何一个族群的母亲都有更强的责任感，和更强的忍辱负重的能力。这与历史的因袭有关，也与旧制度的教化有关。这从一些俗语中也可看得出来。比如：兄弟如手足，女人如衣服。比如：女子无才便是德。比如：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可以说，女性争取自由和解放的道路从来不平坦。这本书的主人公是个囤子媳妇，这个“囤”字，很好地诠释了女性的生存状况。就是四面围堵，没有门。而且这个字没有舒展的笔画，都像折断了胳膊腿一样龟缩在一方区域内。与其对应的是，过去有句话说大门不出二门不迈，表面是对女人的褒扬，这种褒扬其实自私又残忍。

囤子媳妇有她自己的制约和局限，所以，她的选择无关对错，只关乎适宜。对于她来说，我们今天看到的人生的种种可能，让她再活一回，她可能仍然看不到。所以命运才会有其严苛和冷酷的品相，不轻易被改变。

祖祖辈辈的女性，都是在各种各样的规训中活着。潘美荣其实也是这样。她生活在一个旧式家庭，用小小的肩膀承担了本不属于她的一份艰难和责任。她熬过的那些岁月，其实是旧时代的女性必然要走的路，但潘美荣用自己的能量点燃了自己，这让她的身上充盈着一种力量。

胡晓舟：今天回望这部小说中故事发生的时代和环境，在时空上可能会感觉我们和一个童养媳的生活相距甚远，但是作品却引起我们的强烈共鸣。我想，是因为潘美荣不断地从一个女性视角，从一个人的个体视角，去追问、去叩问我从哪里来，我是谁，在我身上发生了什么，我在这个世界如何自处。历尽劫难，最后我的魂魄也要在家乡的上空依依不去，要有所依托，这一切可以说也是人们所普遍面临的精神之境。这和今天的女性对于自尊的坚守、对于自我的追寻，在哲学意义上人们对个体存在的意义、存在的价值的执念和执着心意相通。如您前述，您要用一个女人的百年人生，探讨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的属性、角色、地位及价值，这是写给天下母亲的一本书。您在作品中是如何体现这个想法的？

尹学芸：写童养媳这样一个群体，其实最原始的契机是有一次我下乡，坐在老家的炕头上，遇到一个老人，我特别愿意聊聊当年她出嫁的事情。她说，我15岁到这个家，男人10岁，娶媳妇到家就是干活的，干各种活计。她讲了很多细节，有些被我用到小说里。后来我又接触到了更多的这类女性，某些想法逐渐清晰了。我愿意把这些人物作为活化石、活标本记录下来，让后人知道在女性的命名中还有一个历史阶段。我是知情者。如果不记录，再过三五年，这种激情和文学的感觉，包括对人物的生存状态，可能就淡忘了，消逝了。居家时间真是给了我特别好的时机。一旦确定要写这个题材，就开始心无旁骛。小说进行得很顺畅，源于我对人物的把握，对生活境遇的把握，包括整个命运走向的把握，可以说，每落一个字都很笃定。

这是一个关于天下母亲的故事。我相信，

每个人都能从潘美荣的身上找寻到自己母亲的影子。小时候一条街七八个小伙伴，说起自己的妈妈什么样，都说妈妈的那张嘴根本没有味蕾，馊粥烂饭永远是她吃，因为她吃不出好赖。她吃剩菜剩饭都是应该的。长大些才知道，这样的想法有多么可笑。

有关女性的话题永远说不完。是因为这个话题古老而又混沌。在历史进程中，经常被似是而非的观念所混淆。女性首先是自己，其次才是别的身份和属性。一点一点地觉醒意识，也被写进文本里，作为一种提示和警醒。

胡晓舟：尹老师，在您的作品中，对人与人相处中的相互关系，对我们俗称的人情世故有深刻的体察和精妙的表达，有洞穿世事的通透、练达和智慧。在《太和》描述的乡村生活中，无论是潘美荣和二爷爷之间由自己一家人下落的激烈冲突和矛盾，还是刘方母亲对自己的女儿刘国前后迥异的态度，甚或潘美荣对自己三个儿子、儿媳的看法和相处方式，等等，都让人深切地感到人情世故的微妙。您写出了这背后隐秘、复杂的人性。记得您的中篇小说《李海叔叔》2018年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的时候，获奖词中有一句话是“于曲尽人情中见时代变迁，牵动我们的记忆、经验和情感”。您对此怎么看待？

尹学芸：我的小说写普通人的日常，以及由这些日常构成的情感张力，所以，容易引起共鸣和共情。人性最幽微之处就体现在这种日常生活中。人与人之间因亲密而生嫌隙，或因紧张而生芥蒂。还有，世界上有一种职业叫作家，生来就是来体会世态炎凉的。也就意味着作家的天性禀赋中，有更敏感，或更尖锐的触须。我写出的这些情感，是人性中天然的一部分，被我捕捉到了，成了文字中的养分。所以我特别感谢文学，让这种呈现变得有意思且有意义。

我写作的时候经常会还原生活，把故事放到现实情境中，猜度它的走向，或把人物与现实的人物对应，捕捉有特质的东西。现在都在谈AI时代的文学书写，我想，作为一个语言系统，它可能知道欲言又止、欲擒故纵、旁敲侧击、曲意逢迎这些成语的释义，但内里的微妙以及文字背后的韵味，它永远体会不到。

生命中充满了走向“太和”的元素

胡晓舟：您的小说虽然往往写的是我们在生活中司空见惯的普通人和平常事，却把人物写得极其鲜活，故事写得引人入胜，让人读来欲罢不能，从中体味到生活的无限丰富性。在我社出版的中篇小说集《鬼指根》中的作品是这样，从长篇小说《岁月风尘》《菜根谣》到最近出版的《太和》也是这样。大家谈论您的作品，都认为您特别会讲故事，说您作为作家的叙事能力特别强。您在作品中还非常善于设置悬念。比如，潘美荣的两个“心结”，也是小说中的两个悬念，是怎么“抓人”，耐人寻味。其一，潘美荣到底是不是刘家的宰村刘家？刘方的母亲，她的表姨，真的和她家有亲戚关系吗？其二，潘美荣母亲丢下她，进城找丈夫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一家人下落如何？您的叙事艺术如此成熟、精妙，您能给我们分享一下有什么诀窍吗？

尹学芸：讲故事有些天分，这大概是成为一个作家的先决条件。我和弟弟差三岁，最早的记忆就是哄他睡觉，讲的是民间流传的神话和童话。这些讲完了，我就随口编些稀奇古怪的故事，也能哄他入睡。读初中时，就爱给同学讲小说，把一本书变成故事讲下来，是一种奇怪偏好。因为现在的很多小说不能讲了，是讲不得，没法讲。小说大概也可以这样区分：讲得出来，和讲不出来的。记忆最深处是讲《红楼梦》，老二姐吞金自杀。我们甚至到处去找金子，想验证能不能吃死人。书中的悬念设置是种自然生成，我这样说自己也觉得奇怪，但我确实没为某部小说故意设置过悬念，似乎故事就是这样的讲法。有各种古老的讲法叫起承转合。没有比这样的讲述更适合了。可能，讲述本身也是种技法，被我学到了精髓？

家人之间，亲情之间，有容易断裂的部分。而这些断裂的部分，是可以考验人性的。内里的情由是小说可以介入的。最大的伤害总是来自最亲近的人，

胡晓舟：这部长篇小说名为“太和”，明显有两层意思。第一层意思是这部作品中的故事发生在一个叫“太和洼”的地方，潘美荣的娘家潘家寨就在太和洼的底部，而她的婆家窄村在比潘家寨的海拔高一些的地方，也属于太和洼，所以太和是地名。第二层意思就涉及作品的主旨，您想要表达和传递给读者的东西。您在书中已经借潘美荣三儿子，也就是最有出息、读了医学博士、成为医院院长的老三的口说出了，太和就是大和，是指天地间冲和之气。先对冲，后融合。其实就是阴阳和，你中有我、我中有你。“冲”可以简单地说是矛盾冲突，“和”则是最后归于和谐。小说中的“太和”应该是指一种人生哲学，您是怎么考虑的？

尹学芸：这座大洼坐落在那里，盛满了我从幼年起对它的向往。直到几年前的正月初六，我才开车走了一次。那次行走也有好玩的事。



我们找了高门大户人家讨水喝，坐下交谈才知道，是朋友的朋友。家乡的方言中，“和”字读轻音，就含在舌苔底下，音不完整，字也吞了半边，远不像书面表达这样，有种周正的气质。所以某一天，我端详这两个字的时候，突然看出了字表深处流动的气韵，大而磅礴，确是润物无声。中国人对“太和”两个字不陌生。历史上它曾是帝王的年号。故宫有太和殿，是皇帝议事的地方。“白头万事都经遍，莫为悲伤损太和”又上升到精神层面，就像三生万物，有种无尽感。我当即决定，用这两个字做书名。

生命中充满了走向“太和”的元素。这种调和的关系表现在阴阳消长、事物渐变的过程中，也表现在阴阳转化、事物极变的过程。春夏秋冬四时节气正常交替就是太和的表现，无过而无不及。这样一种状态有利于万物生存。

胡晓舟：您的很多作品都表现了人物在特定环境下的悲情色彩，但与此同时，我们在您的作品里又读出了一种不屈不挠、生机勃勃的向上的力量，这是为什么呢？

尹学芸：苦难是人生的一个阶段，你迟早都会走出那个阶段。因为，你永远都不会留在岁月的这一边。一座村庄居住着形形色色的人，作为地球上最基本的一个群体，我能从他们身上感受到一种生命力，一种命运感。大概就是因为终年与土地打交道，能从他们身上感受到土地的宽和、韧性以及努力供给的生命状态。依附于土地上的生命，都会生机勃勃。

胡晓舟：您对写作和阅读怎么看？

尹学芸：特别愿意借这个话题谈点看法。我获鲁奖的时候，有些作家留言给我，说从我身上看到了希望。在这之前他们都觉得我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人，天底下那么多作家，我生活在那么偏远的地方，怎么天上掉馅饼就落在了我头上？

我从小非常小的时候就热爱文学，很多同道友人生活或事业有了些变化，就从这条路上逃遁了。我想，我是把读书和写作当饭吃的。吃了这么多年，越来越觉得这样的饭更营养宜人。

阅读其实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。现在这样一个时代，人们容易被碎片化的快餐文化吸引。看莫言说，他有时也刷短视频，我不由得笑了笑。需要放松的时候我也刷，但注入太多的时间和精力，就不值得了。文学是苦差事，耐得住寂寞很重要。阅读是通往写作的唯一途径。人生苦短，应该知道什么是好的东西，有节制地让自己回归。如果年复一年看那些碎片化的东西，到最后能留下什么？什么都留不住。年轻的时候阅读，难读的就搁置了。现在反而是，越难读的越想去读。这大概也是成长，所谓活到老学到老。这个“学”字，才永远不会辜负你。